

难忘在首都警卫部队的岁月

□刘洪连

1964年冬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沂蒙山区入伍来到北京。我们在六王坟营房训练一个多月后，就补入到连队，成为一名光荣的首都警卫战士，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光荣任务。自此，我在北京度过了17个春秋。此间，我曾从连队调到营、团、师机关工作，后来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首都警卫部队的峥嵘岁月。

十八九岁的年纪，风华正茂。当我们穿上崭新的绿军装，背起冲锋枪在首都站岗执勤时，心中充满了战士的光荣和骄傲。我们连队的住处相当分散，有八九个执勤点。连队的生活艰苦而紧张。熄灯后，全班睡在一个通铺上，枪就放在身旁。我在睡眼朦胧中，能警觉地听到验枪退子弹的声音，也意识到自己要接班站岗。我忘不了在大兴、大红门、永定门站岗的日子，忘不了在前门大街巡逻的日日夜夜，忘不了在天安门前执勤的自豪和仰望毛主席挥手致意时的激动，忘不了雪夜冰冷的冲锋枪与温暖的棉大衣，忘不了北京春天的柳丝。多少个星期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流连忘返，目睹古都的雄伟与历史的变迁；多少个沸腾的日子，我们在军营摸爬滚打，勤学苦练；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我们警惕地站在哨位上，为做好警卫工作而不知疲倦。

1969年，首都卫戍部队进行了冬季野营训练，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卫戍区的总结报告上作了著名的“11·24”批示，并在我们师的左副师长帮助行军战士扛枪的事例下面画了一道红线。此后，我参加过两次野营训练。一次从北京经阳泉等地到达山西平型关，历时两个月，行程两千里，途中昼夜兼程，进行了奔袭、山地射击等训练。另一次途经怀柔、延庆、怀来、顺义等县，历时月余，行程千余里。

1972年，在毛主席外交策

我忘不了在大兴、大红门、永定门站岗的日子，忘不了在前门大街巡逻的日日夜夜，忘不了在天安门前执勤的自豪和仰望毛主席挥手致意时的激动，忘不了雪夜冰冷的冲锋枪与温暖的棉大衣，忘不了北京春天的柳丝。



1976年9月，刘洪连（左三）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时与战友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略影响下，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在这期间，上级曾派我们去首都机场执行警卫任务。1971年底，从我们营挑选了部分战士组成警卫队，秦双八任队长，我任指导员，主要负责国际招待所、地面卫星站及尼克松、田中停机坪的警卫任务。叶剑英元帅亲临哨位视察，规定了卫兵着装，要求配备冲锋枪、望远镜等。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并在北京大学聘



1972年2月，刘洪连(坐车内者)在首都机场执行警卫任务。

请教师学习了常用英语，进行了执勤演练。我们首先担负了黑格先遣机组驻地警卫。当时首都降雪，哨兵冒雪立于哨位，英姿勃发，受到美方人员的称赞。

回顾这段执勤生活，特别是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当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空军一号”降落于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前往迎接。我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有幸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了毛主席与尼克松会晤的照片。这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6年9月9日，那是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此后，当我们作为首都警卫战士的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时，看到毛泽东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内，在低回的哀乐声中，我随着悲痛的人流鞠躬告别，觉得心情似铅一样沉重，眼泪夺眶而出。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颗智慧的头脑会停止思考，

一颗伟大的心脏会停止跳动！然而，这却是令人心碎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976年12月11日，我作为军政大学学员参加了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在我手拿铁锹铲土的一刹那，感情的潮水如大江奔流，蓦然想起恩格斯在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评价马克思的那段话：“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长期的警卫工作，不仅使我加深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而且也深深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后来，我全家参观了毛主席的丰泽园故居，看到了伟大领袖当年的俭朴生活。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书的世界。

曾经辉煌的青岛神州大药房

□侯修圃

创建药房，发展民族制药工业

神州大药房始建于1923年，地址在李村路49号，创建人为张国良。张国良，安徽人，生于1898年。他自幼聪慧，尤其喜欢医学。1919年，他毕业于天津军医学学校，后赴日本留学，学习制药化学专业，3年后学成回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张国良进入一家企业工作，但一直想自己出来干一番事业，技术没有问题，但资金哪里来？

恰巧，张国良祖父的弟弟时任掖县县长，由他的儿子张子青(即张国良的堂叔)投资五千银元，盘下博山路和李村路拐角一处房子的底层。1923年，神州大药房正式开业，开始规模较小，门面仅40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人。他实行薄利多销的策略，发展很快。1924年，张国良的弟弟张松岩由天津军医学校医疗班毕业来到青岛，弟兄两个合作又开起神州诊所。正好张松岩擅长内科和小儿科，就由张松岩主持诊所的一切业务，并聘请了护士、药剂师各一人。一开始门诊量较少，每天也就20多人次，外科只能进行一般的包扎换药。闲暇，张松岩也协助神州大药房的工作。

当时，洋药充斥青岛的医药市场，民族制药工业受到排挤和打压，张国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精通日语，又在日本专门学过制药技术，决心制出国产药来济世救人。他相继把药房的二楼和三楼盘下，二楼为制药车间，三楼为病房和客房。陆续买了压片机2台、滚乳机2台、抛光机1台，由张国良研制配方，专业技术人员制药。当时，设置管理人员数人，还招了工人。由于张国良积极经营开拓，较短时间里研制出的中成药和西药品种由最初的十几种发展到一百多种，有酏剂、片剂、合剂和丸剂等，其中“神州五积神”(驱蛔虫)、“神州十滴水”(治腹痛、腹泻)、“四妙散”(治胃痛)和“赛大蒙”(退热止痛)等影响最大，不仅在青岛，而且在胶东半岛一带颇为畅销。

1925年1月，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王尽美，在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大会之后，受孙中山先生亲自委托来青岛开展工作，下榻在神州大药房三楼并在此设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当时，王尽美身患肺结核，身体很弱，抱病工作。这期间，由青岛市督办公署教育科长鲁佛民协助王尽美的工作。

青岛、济南开设数家分店

由于经营有方，神州大药房不断扩展。1940年前后，在天津路开设了神州大药房分号“三光”药房；在高密路设立“神圣堂”药房；在博山路开设“建国”药房，不仅卖药，而且设中医师坐堂行医。同时，在胶县城内设神州大药房分号，由张国良外甥袁寿康负责经营。此时，神州大药房从业人员达50多人。

1940年初，神州大药房扩张到济南，先在济南二大马路、纬五路开设神州大药房兼诊所，由张松岩负责经营管理；在二大马路中段，开设九州大药房，由张国良外甥袁寿芬经营；在济南城内，还开设神州大药房分号，由张国良之侄张文焕负责。神州大药房声名鹊起，口碑极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国良之子张文光、侄子张文藻相继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到神州大药房和神州诊所工作。此时，青岛神州大药房和诊所的发展达到巅峰。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在二楼设病房3间，有病床12张；有手术室1间、无影灯1个，备有常用

外科手术器械，可做一般腹部外科手术。还设有化验室1间，有化验师1人、学徒1人，当时可做4大常规及梅毒康瓦氏试验等。诊所凭借其技术优势，多次成功做过阑尾炎、疝气修补以及胃部肠部等手术。遇到特殊手术，就聘请山大附属医院有关大夫协助完成。神州诊所实际就是一所小型私人医院。因而，这所药房和诊所还培养了不少医药和管理人才，有些人解放后成了公立医院的技术骨干。

顺便提及一下，京剧名票季砚农先生曾是该店的药剂师。神州大药房和诊所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医风有口皆碑。张国良医疗团队数十年来，对待患者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不论高下贫富一视同仁，都给予精心治疗。特别是对生活贫困的患者，常常送医赠药，分文不取。遇有病情危急的患者，不分昼夜，随时出诊看病，受到病家的尊敬。

1956年公私合营，神州诊所合并到李村路诊所；神州大药房规模缩小，在底楼占用部分门头开药房兼门诊，由张国良坐诊。1964年，由于张国良先生身体欠佳，药房黯然停业，闻名遐迩的神州大药房就此画上了句号。

老潍县的“官邸”

□陈瑞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舍，就是现代官邸制的雏形。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都居住在官舍内，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致仕(退休)离任或官员正常调动离任，须尽快腾出官舍，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物品。任职期间居住官舍不需付房租，因此，它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老潍县的官舍，按照封建时代州县衙门建筑规划的要求，建在县衙门的二堂之后，是一单独的宅院。其规模据《潍县志稿》记载：“进宅门有传达室，正面为三堂三楹，东西各有会客室、收发处，堂后为上房(寝室)七楹，院里有东西两厢作为书房，上房东有櫺察。另有附属偏房六间”。看来，从房屋的数量上说，官舍总共多达三十多间，在当时可谓设施齐全，面积宽敞。作为县官的内宅，它又是绝对隐私，下属一般不能随意进入的。按规划，内宅也只有一个通往前庭的正门，据说，朝廷有严厉的法规，禁止地方官在内宅另开旁门或后门。

潍县，明洪武九年撤州改县。之前，知州张莘重建过州衙，明洪武十三年重修后，历经嘉靖、万历、崇祯年间屡次重修、再经康熙十年(1671)地震损毁后修复，其间近六百年时间，州县衙门建筑的形制、规模基本未变。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改县后仅明清两代534年间，这里居住过的县官有178人之多。平均每位县官住期三年。乾隆年间，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他在这里连住七年，是潍县住官舍最长的地方官之一。

封建时代对于地方的官舍，虽有统一的形制与要求，但因县治所处的政治、军事、交通位置、县域的大小、特别是地方经济财力的不同，地方的官舍也就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档次。尽管住官舍是福利待遇，但是也有个宜居不宜居的问题，例如，郑板桥住进潍县的官舍时，当是在康熙年间地震官舍修复之后约50年，可谓也是老房子了。郑在任职期间，虽然曾连续三年大修了潍县的城墙，而后又大修了城隍庙、文昌阁，还有状元桥，但是地方志并没有找到他修缮官舍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当时潍县的官舍相比他之前在范县任知县住过的官舍的条件好多了。他在《范县署中寄弟墨》的书信中曾提到：初任山东范县知县，因所居署屋(即官邸)系前朝(明代)建筑物，低而狭，潮湿难堪，由此触发了他的清气，饮食无味，两足溃烂。请医生调治，大夫告诉他应居朝阳而不返潮的高厦。因此他不得不搬出官舍，迁移到署后因主人携眷赴京而空闲的邓家花园里。这里屋宇轩敞，花草清幽，与县署只隔一巷，朝往夕来，也很便利。但是每月可要自掏腰包，打发房租六十千(一千就是俗话说的二吊钱)呢。但是，即使自己宁肯花钱租房住，郑板桥也不曾花费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缮当时低矮又潮湿的范县官舍，这件事倒值得令人深思。